

名人与佛禅

方立天
黄夏年

主编
策划

潇洒人生

苏
轼
与
佛
禅

李赓扬◎著
李勃洋



河南人民出版社

名人与佛禅



潇洒人生

苏

轼

与

佛

禅

方立天 主编
黄夏年 策划

李康扬 著
李勃洋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潇洒人生:苏轼与佛禅/李赓扬,李勃洋著. —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9
(名人与佛禅/方立天主编)
ISBN 7-215-04848-9

I. 潇… II. ①李…②李… III. 苏轼(1036~11
01) — 佛教 — 思想 — 研究 IV. B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2563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南阳印刷总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 字数 193 千字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4.00 元

总序

方立天

“名人与佛禅”三书将要出版时，河南人民出版社寄来三书的校样，嘱我写一序言，盛情难却，勉力为之。

“名人与佛禅”包括《迷路心回因向佛——白居易与佛禅》、《出入自在——王安石与佛禅》、《潇洒人生——苏轼与佛禅》三书，是三位作者分别对唐代白居易，宋代王安石、苏轼三人与佛教禅宗的关系的专题研究成果。三书从宗教关怀、宗教情结的侧面揭示出三位历史名人的精神生活、心灵境界和文学创作、文化业绩。内容丰富，特色鲜明，为白居易、王安石和苏轼与佛禅关系的研究带来一股清新的学术空气。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公元 772——846 年）号香山居士。早年即亲近禅师，中年皈依佛门，修习禅法，受持净戒，发愿往生西方极乐净土。据白氏晚年自撰墓志铭载，其生平志向为“外以儒行修其身，内以释教治其心，旁以山水风月诗歌琴酒乐其志”。白居易运用佛教义理作为修身养性的准则，理想精神生活的规范，信奉佛禅成为他人生态度和方式的一个重要方面。白居易的佛教信仰对其诗歌创作影响甚大，他在诗歌中表达的对上层权贵的轻蔑，对仕宦利禄的冷漠，对传统价值观的鄙弃，对超越世俗境界的向往，丰富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内容。

王安石（公元 1021——1086 年）是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他主张改革政治，推行新政，但迭遭挫阻。王安石晚年归心释

氏,舍宅为寺,茹素持名,参究心要。他热心注解佛经,阐发佛理。他在文字学名著《字说》(已散失)中多以佛经语言解释字义,他引禅入诗,以诗论禅。王氏现存的部分诗文,反映了一位倾心政治改革而后又隐退田园、结缘佛门的古代士大夫的心声与追求。

北宋文学家、书画家苏轼(公元 1037——1101 年),号东坡居士,与父洵、弟辙合称“三苏”。苏轼的父母信佛,受其影响,苏轼青年时代就亲炙佛法,后习染渐深。他广泛研习了《华严》、《维摩》、《圆觉》、《楞严》、《法华》等经,深有体悟。对禅师语录又情有独钟,所作空灵冷寂的诗文,禅味禅境随处可感。苏轼也主张佛与儒、老融合协调,肯定各有所长,各有特定价值。与白居易相似,苏轼好佛也是为了吸取佛理,思索人生,求得心泰神宁,超然洒脱。佛教经典对苏轼的诗文创作及其思想内涵与语言艺术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

“名人与佛禅”三书,分别就白、王、苏与佛禅关系的方方面面作了比较充分的展示与论述,分析与评论。其中尤以这五个方面更为醒目:一、佛禅与人生,尤其是与古代士大夫的人生关系;二、佛禅与政治,尤其是与古代士大夫的政治生涯关系;三、士大夫信仰佛禅的特点,即信奉佛禅士大夫与出家僧侣、禅师,以及与信佛的平民大众在信仰上的差异;四、佛禅与儒、道,即三教的关系,尤其是佛与儒的关系;五、佛禅与诗文,尤其是与诗歌创作的关系。三书为广大读者提供了比较丰富的文化信息与精神资粮。我们有理由相信,三书的出版问世,必将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和关注,并为读者带来启发和教益。

2001 年 7 月 18 日

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



目录

第一章 以僧为友不念佛	1
幼年佛缘	2
梦里是僧	6
第二章 慈悲拔苦更与乐	16
乐善好施	17
佛心筑堤	23
破除迷妄	31
第三章 系狱遭贬悟禅机	46
砥节砺行	46
仕途坎坷	50
狱中彻悟	60



第四章	躬耕东坡为居士	66
	初到黄州	66
	躬耕东坡	70
	结交布衣	87
第五章	烧猪佛印参寥泉	100
	“常总法嗣”	101
	烧猪佛印	104
	诗僧道潜	108
第六章	禅房花木蕴诗情	117
	僧寺佛花	118
	禅房题壁	132
第七章	诗逢佳处辄参禅	148
	以诗论禅	148
	诗蕴禅机	161
第八章	悟得佛画像外意	166
	佛画喻禅	167
	佛画寓情	173
第九章	且尽卢仝七碗茶	183
	吃茶去	184
	茶禅真谛	191



第十章 世缘终浅道根深	201
初识维摩	201
潇洒无住	205
万花丛中	213
酒肉穿肠	218
病老禅悦	229
结 语	235
附录一：苏轼生平行迹简表	238
附录二：可参看的基本书目	249



第一章

以僧为友不念佛

北宋时,四川成都有一座寺院——中和胜相院,香火旺盛,非常有名。仁宗至和二年,也就是 1055 年的时候,常有两位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到寺中来。他们或者与寺中的惟度大师谈古论今,或者不厌其烦地观赏、揣摩寺中的唐僖宗和他的从官文武的画像,久而久之,渐渐地便与惟度大师和他的同门惟简大师成了朋友。多少年之后,两青年中较为年长的那位应惟简大师的要求做了一篇《中和胜相院记》,这时人们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苏轼苏东坡,人称“大苏”;与他同来的是比他小三岁的弟弟,“小苏”苏辙。

后人根据这篇《中和胜相院记》,判定苏轼兄弟此时就已倾慕佛法。其实,真正吸引兄弟俩的,是寺中那精妙冠世的唐僖宗像以及惟度大师讲的那些在史书上看不到的唐五代故事。不过,这也许未尝不是一种与佛的因缘。

提到苏轼与佛教的因缘,说来话长。



幼年佛缘

仁宗景祐三年的十二月十九日,按公历算是 1037 年 1 月,苏轼出生在四川眉州的一个世代文儒的知识分子家庭。他们的远祖苏味道,是唐代有名的文人;两位伯父苏澹、苏涣都是进士。父亲苏洵虽然未得科举功名,但后来的事实却证明,在父辈三兄弟中,苏洵的文才实际是最出色的,可谓大器晚成。

苏轼兄弟可以说都继承了父亲的才情与智慧,只不过苏轼要更出色一些。七八岁的时候,苏轼进学读书,由于聪明颖悟,他经常得到老师的称赞。等到十二三岁,父亲苏洵由于屡试不中而回到家中,于是兄弟俩就跟随父亲读经论史。有的时候,在外做官的伯父苏涣回来,也对他俩进行一番督导。苏涣是一个极为严谨端正的人,小的时候学做文章,每天都有一个严格的计划,不完成当天的计划决不休息;年长之后在外做官,也是言行谨慎,勤勉不辍;即使每天回到家中,也是绝无浮薄怠惰之容。苏涣常常以此来教育苏轼兄弟,要他们慎行而寡过。而苏洵自从科场失意回到家中,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让自己的两个儿子考中进士。如同现今很多由于“文革”而耽误了上学的中年人一样,希望孩子能够实现自己未能实现的理想。于是对苏轼兄弟的管教就更加严厉。

苏洵并没有太多的田地产业,平时也不出外营生,一切生活来源都靠家中祖传的一块不大的田产,生活过得比较清苦。但尽管如此,他还是逐渐积攒下了数千卷的藏书,并将它们视做自己最宝贵的财产,希望能够传给后人。他曾经对自己的两个儿子说,读这些书,“内以治身,外以治人,足矣!此孔氏之遗法也”。

尽管我们说苏轼的一生和佛家有着不解之缘,但客观地说,在



青少年时期,他所受到的还是正统的儒家教育。在这种中庸、内敛、严整的家风的熏陶下,通过科举,追求功名成为苏轼兄弟一生不变的人生目标。佛家此时对苏轼的影响还只是零星而且间接的。

顺带要记上一笔的是,道家思想在苏轼的少年时期也曾经产生过不小的影响,构成了他人生哲学思想的三分之一。苏轼八岁上学的启蒙老师,就是一位道士——天庆观的张易简;而与苏轼同窗的小伙伴中,还有一位陈太初,是道士的儿子,后来他自己也成了道士,还“荣登”曾慥编的《集仙传》,一本类似于道士中的“名人录”性质的书。

苏辙在东坡死后,为哥哥做了一篇墓志铭,其中提到,兄弟俩小的时候,有一次跟随父亲读《庄子》,读罢苏轼慨叹说:“过去我有很多想法,却不知道如何表达;今天一读《庄子》,真是深获我心。”可见其幼年对道家思想也是非常认同的。苏轼后来在文章中曾回忆自己七八岁的时候迷恋道术,甚至到了不愿意结婚做官的程度,是在父亲等人的逼迫之下,才走上“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但他却一天都没有忘记求道自适、隐逸山林的志向。在给朋友李伯时《卜居图》写的跋语中,苏轼还不忘感慨一下:“余本田家,少有志丘壑。”

不过,文人写回忆文章,里面很多想法其实只是创作时的心态,而并非当初的思想,更难免有一些借题发挥的想法。苏轼大概就是如此。修习道术对青少年时期的他来说其实只是一种愉快的经历,为枯燥而繁重的学习生活增添了一些新鲜与欢乐。而多年之后,引人回味的就只是这些因快乐而印象深刻的记忆;那些真正带来今日成功的东西,反而会由于它们如同每天的睡觉吃饭一样平淡,而为人们所漠视。

佛家也是如此。它就像是少年苏轼生活中的玩伴,新鲜、有



趣,因而苏轼才去接近它,而对于佛教的教义、戒律,以及佛教的种种神异之处,他却并不真正相信。但是,无心插柳柳成阴。佛家讲究“无住”、“不执著”,苏轼正是以一种轻松、随意的心态开始了与佛家的交往,在不经意中暗合了“无住”的佛教真谛,从而也注定了他的一生将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

探索、发掘苏轼的佛家思想根源是一项困难的工作,因为青少年时期的他从未有意识地去与佛家进行行为及思想上的接触,并且,同许多封建士人一样,苏轼的思想是典型的儒释道杂糅的。但是,这又是一项饶有趣味的工作,因为苏轼青少年生活中无处不有佛踪禅影,生性开朗率真的他享受着佛教带来的种种新鲜与有趣。并且由于时代的因素,我们还不难从中发现一些动人的神异色彩。

首先让我们看看苏轼的家乡。眉州在“天府佛国”四川的西部,今成都以西,宋代时并不算大州。“眉州”是因西南二百里横亘的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峨眉山而得名,距离那举世闻名的乐山大佛也不远。由于所处“大后方”,较少经历战祸,加上周边地区佛氛炽烈,因此,眉州一片安然恬淡的世外之象。州境内有眉山,并不算高,却既有巴山蜀水的清秀,又有得之于佛光道影的一份淡雅。在它掩映之下的眉州,小桥流水,楼台亭榭,辅以阴阴的垂柳,淡淡的春桃,颇有几分江南水乡的味道;但是又并无秦淮的脂粉气,家家院落,户户竹篱,笼罩在平静、疏懒的氛围中,透出的是一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神韵。所以人称“小桃源”。苏轼曾描述家乡是“清江入城郭,小圃生微澜”;而苏辙则说“仿佛城南路,繁香扑市桥”。

如果说软水温山、灯火楼台的金粉秦淮是种精致、浓酽之美,能够人流连繁华富贵、顿生仕进之心,那么,眉州的这种自然恬淡、与世无争无疑是一种疏朗阔达的原始、纯净之美,可以荡涤尘



世的杂念,扩大人的胸襟,培养一种安然淡泊的人生情怀。苏轼人生的后半段之所以能够与众不同地淡然处世,宠辱不惊,之所以能够自然地向佛教靠拢,也许正是得益于他性格中那种得之于幼年成长环境的恬淡与自适。

苏轼的家庭中也有佛教的影响,他的父亲苏洵就好佛习禅,经常与僧人往来。在苏轼母亲去世之后,苏洵还特地请人塑了六尊菩萨像,后来施舍于庙,可见其笃佛之深。

苏轼七岁那一年,在一次登峨眉山时遇见了一位老尼姑。这位老尼姓朱,叫什么名字他记不清了(苏轼讲这件事的时候,没提这位老尼的法号,却只提她的俗姓,这一点很使人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当时她已经九十多岁了。她自称曾经和师傅去过五代时后蜀皇帝孟昶的宫中(按年代推算起来,那时她至多不过十四五岁)。蜀主孟昶有一位花蕊夫人,姓徐,四川青城人,会吟诗做文,在历史上非常有名。有一年夏天,天气很热,蜀主孟昶与花蕊夫人晚上在摩诃池上纳凉,当时孟昶做了一首词,被朱老尼听到了,八十多年之后,这位老尼竟还清楚地记着词句……

九秩老尼的故事是苏轼在一篇词的小序中提到的,也许只是一种为文的需要,当不得真。但后人却还是认为从中看到了苏轼少年时的佛踪禅影。其实,苏轼在青少年时与僧家交往更多的还要算是去寺庙中游玩。峨眉山是佛教四大名山之一,传说曾为普贤菩萨的道场,周围其他山上也有很多寺院。少年苏轼经常去这些寺院,当然不是去参禅,而是和小伙伴们去寺庙道观里玩儿。醴泉寺中有一棵百年的老橘树,他常和表弟去那里摘橘子,直到多年以后,对此仍念念不忘;据《蜀中名胜记》记载,苏轼少年时还经常在连鳌山栖云寺中读书,而东坡山中有实相寺,相传也是苏轼少时读书的地方。由于他后来几十年中和佛家密切地交往与联系,很自然地会使人们将这些少年时的游玩之举当成苏轼奉佛的开始,



其实,这些事只能算是拉近了苏轼与佛教的感情距离,因为青少年时的他并不信佛。

在《中和胜相院记》中,苏轼清楚明白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在文中说自己经常会抓住佛理中的破绽,对惟度大师等僧人进行诘难,以至于令他们无言以对,而不得不称苏轼是“外道魔人”;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并不信服佛教的教理教规,而将惟简请他为寺院写记的举动看做是滑稽可笑之举,如同请老鼠做粮官;而他之所以会和惟度、惟简大师成为朋友,也完全是由于几位大师气宇轩昂,落落大方,生性浑厚。与他们的友谊纯粹是一种文人雅士间的惺惺相惜、脾气相投。

今人张中行老先生曾将士人与禅的关系分成两类,“过世间生活,日久天长,有些烦腻,或只是想换换口味,到禅林去转转,或同禅门中人你来我往,是近禅。过世间生活,不管由于什么,失了意,于是向往禅门的看破红尘,身未出家而有出家之念,并于禅理中求心情平静,是逃禅”。近禅、逃禅,用来表述后来中、老年的苏轼还可以;而对于青少年的他,禅门并不具有宗教信仰的意义,而只不过是一个充满趣味的场所,可供玩耍而已。所以,也许以“游禅”来概括苏轼青少年时与佛家的交往是再确切不过的了。

梦里是僧

尽管小时候的苏轼口口声声不信佛,但命运似乎在和他开玩笑,他的一生中始终都没有摆脱佛教的牵缠。对于以僧为友的东坡居士,相信宿命论的古人更是将他与佛教的因缘赋予了种种神异色彩。正如佛祖释迦牟尼一样,一切的不平凡从他降生时就已经开始了。



苏轼出生的时候,除了带给苏家以喜悦之外,并没有给眉州小城带来什么波澜。然而,随着父子三人后来成了名人,在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记载中却是另一番景象。

古人相信天人感应,人间有大事发生,在天象和自然界中都会有反应,比如仓颉造出了文字,老天爷并不愿意,于是天上就下谷子(粟),半夜还会听见鬼哭;而圣主实行了仁政,天上则会下饮料般的“甘露”,地上也会涌出甜美的泉水。如果有圣贤降生,更是要出现种种神迹。传说佛祖诞生之时,天上有天女散花、九龙喷水。苏轼这样的天才自然也非凡人,在元代刘祁所做的《归潜志》中就记载:“昔东坡生,一夕眉山草木尽死。”其他的书中也有类似的说法——“眉山生三苏,草木尽皆枯”、“蜀有彭老山,东坡生则童,东坡死复青”(“童”,山无草木叫做童),等等。人们相信天才是夺天地之精气而生,天地的营养都被苏轼夺走了,草木当然就活不了了。如此一来,苏轼被罩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自幼为成才而付出的辛苦并不被人注意,相反,眉山的绿化倒似乎是被他破坏了。其实,苏轼生在十二月十九日,隆冬腊月,北方早已是秃树衰草、万里雪飘了;四川眉州尽管地处西南,但如果真赶上个寒流或是气候异常,那些山间的蒿草和树木没准儿真的“尽枯”,也未可知,与苏轼的降生显然没什么关系。

出生时的异象意味着身世与众不同,但是,关于苏轼的神异传说远未到此为止。苏轼与佛教的因缘还有另一桩有趣的公案,那就是他经常提到的自己是和尚转世的事情。

中国人在汉代以前本没有转世的想法,那时的善恶报应观念是以天人感应的形式存在的。人们相信,如果所行非善,那么老天爷就迟早会降下灾难,进行惩罚,也就是我们今天还可以听到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那时的人们从没想过报应会拖延到来世。



直到汉代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才带来了佛教的六道轮回理论。这种理论本身也并不是简单的今世与来世善恶轮回相报,而是有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六道之分,根据今生的善恶所行决定来世转生六道中的不同层次。但是普通民众无法掌握如此繁琐的理论,因此,在轮回转世的外壳下,老百姓对其进行了简化,将轮回看做是只在前世、今世与来生之间进行,自己今生的祸福业果完全是受前世业因的制约,而同时今生的所造业缘也制约决定着来世的命运。

不仅如此,由于民间信仰的非系统性,本来在下层民众间影响深刻的神仙迷信思想也逐渐被杂糅进轮回转世观念中来,对于那些非常聪明颖悟、有卓异才能的人,人们会认为他是天上的神仙下界或者说他前生就是某一个有能耐的人。

李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他出色的文学才能,人们都说他是文曲星转世,连自号“四明狂客”的贺知章见了他都称呼他为“谪仙人”,意思就是说他前世是天上主司文运的星君,是神仙下凡。《水浒传》引首中则说“文曲星乃是南衙开封府主龙图阁大学士包拯,武曲星乃是征西夏国大元帅狄青”,为当世的能人赋予了一个天神的身世,同时也表明大宋江山乃奉天承运,有天神护佑;而此时的文曲星则由李白变成了包拯。在中国古代人的头脑中,大概这文曲星、武曲星从来都不在天上老老实实在地待着,经常转世“下基层”,展示文韬武略,兴邦定国。

苏轼并不认为自己前世是什么神仙或是文豪,根据古书的记载以及苏轼诗中的一些言语得知,他只觉得自己的前世是一位和尚。宋人笔记中有很多相关的内容。



苏轼与道潜^①和尚是一见如故的诗友，他们经常一起出游。在中国古代，特别是魏晋唐宋，文人与僧人一直保持着良好而密切的朋友关系，因为他们在文学文化及思想哲学上有很多共同语言。当时，僧人中很多人本身就是一流的学者、诗人，或者宽泛地说是“文化人”，比如晋代的支遁、唐代的皎然以及宋代写作《冷斋夜话》的惠洪，等等；而士人中也有很多人精通佛理，甚至为居士，比如创作了《文心雕龙》的刘勰以及香山居士白居易、六一居士欧阳修、东坡居士苏轼，等等。僧人与文人的交游往来，诗文唱和，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道风景。

宋人何蘧在《春渚纪闻》中记载：一日东坡与参寥子游西湖寿星寺，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这里，在到方丈之前，他就对参寥子说：“我生平从来没有到过这里，可是，在我的眼中，这里的一切都十分熟悉，似乎曾经在此生活过一样。你看，从这儿到忏堂的这一路台阶，我知道应该是九十二级。”参寥子派人一数，果然是如此。于是苏轼就解释说，他的前世是这里的僧人，今天寺中的和尚都是他的法属。除此以外，东坡在《和张子野见寄三绝句》一诗中也说，“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似乎其前世真的是一位杭州的僧人，并且在死去之后还没有喝民间传说中的孟婆茶，所以能够将前世的种种细枝末节都记忆得清清楚楚。

而在《冷斋夜话》中，记述的关于苏轼前世为僧的传说则是另一番面目了。

苏轼的弟弟苏辙贬官筠州高安时，与洞山的和尚云庵是朋友，相交甚欢，子由（苏辙字子由）经常去洞山与云庵大师游山谈禅。此外，还有一位圣寿寺的聪禅师，是四川人，因为是同乡，也与他过

① 道潜：号参寥子，博闻强记，工诗文，因“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风上下狂”这一禅偈而闻名于世。他与苏轼、秦观皆为诗友。